

什么是绥芬河

本报记者李凤双、邹大鹏、马晓成

76岁的李恩泰在中俄边境小城绥芬河生活了一辈子，他从没想过，这座中国东北边境的“百年口岸”，会以这样的方式“出名”，比当年用暖水瓶换鱼的故事动静还大。

1987年，绥芬河市与俄罗斯的波格拉尼奇内市，用两张白纸和复写纸完成了第一笔交易。1000只气暖水瓶和10万公斤苹果，交换了3万公斤比目鱼和5万公斤明太鱼，小城从此成为中俄边境线上耀眼的“珍珠”。

新冠肺炎疫情来袭，这个位于黑龙江东南角、曾被戏称为“要用放大镜才能在地图上找到”的中俄边境小城，突然成为举世目光聚焦的焦点：3月27日至4月13日，经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入境2497人，其中322人确诊新冠肺炎，还有无症状感染者38人，一时间常住人口仅7万的小城成了抗“疫”前线。

绥芬河在哪？为什么是绥芬河？这座百年口岸的诞生与发展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偶然，也孕育着各种各样的必然，从几个历史长河的精选片段中，我们来寻找答案。

因融通而生

每天上午9点30分左右，都会有一趟“绿皮”火车缓缓驶离绥芬河火车站。和大多数“绿皮”火车一样，它的内饰十分普通，不过这趟列车车头上悬挂着中国国徽，彰显了它国际列车的身份。

火车开行5分钟左右，会从一个桥上驶过，这座桥上镶嵌着“1903年造”的铁路桥上穿过，这座桥被称为“远东第一桥”的俄罗斯风格铁路桥历经沧桑。

再过几分钟，它会穿过拥有高高穹顶、俄式窗廊的百年绥芬河老火车站，穿过3号洞、2号洞，穿过国境线，驶向不远的俄罗斯小站格罗迪科沃……

1903年1月，清政府设立“总理绥芬河铁路交涉局”，绥芬河第一次以一个城市的身份出现在地图上。

如果没有铁路，也许根本不会有这座城市。最初，小城与铁路无缘。

19世纪末，沙皇俄国为了自己的战略目标，在中国领土上修建了一条以哈尔滨为中心，西至满洲里，东至绥芬河，连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“中东铁路”。

这条铁路原本打算在当时的东宁县三岔口修建，并以东宁境内水系绥芬河作为站名。可修筑铁路工作人员发现，当地的地质结构并不适合修建铁路，铁路只得向北移动了50多公里，这就是现今没有绥芬河流过的绥芬河市。当时，小城依山而建，林木丰茂，我们至今也很难在文献中准确找到对其之前历史的更多记载。

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，因其距俄罗斯对应口岸波格拉尼奇内16公里，距俄远东最大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210公里的独特地理位置，迅速成为连接东北亚和走向亚太地区的“黄金通道”，这也奠定了绥芬河地区交通、通讯、通商的基础，使它得以与符拉迪沃斯托克、哈尔滨近乎同步的发展。

据绥芬河市官方史料记载，1923年3月，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设绥芬河市政分局；1927年4月，国民政府成立东省特别行政区绥芬河市；1933年7月，绥芬河公署成立，隶属伪北满特别区公署。1930年代，有俄、日、朝、英、法、意、美等18个国家的使节和商贾云集于此，文化和经贸交流异常繁荣活跃，五颜六色的各国旗帜林立市区，时称“旗镇”和“国境商业都市”，并获得了“东亚之窗”的美誉。绥芬河还在中国东



4月15日，绥芬河口岸。这也是绥芬河第三代国门。张涛摄

北边睡最先开通了火车、汽车，最先有了电灯、电话，被冠之“文明中心”。彼时，来自内地和多个国家的商人有1万多人，常年往来于绥芬河与符拉迪沃斯托克（海参崴）之间，从事边境贸易，人称“跑贩子”。

在今天已经被改造为中东铁路纪念馆的绥芬河老火车站内，通过一幅幅老照片，我们可以窥探到铁路为这座边陲小镇带来的繁荣，而在绥芬河老城内，一座座俄式建筑，也记录了这座小城曾经的繁荣。

与邻国俄罗斯的交流、融通，是绥芬河与生俱来的特质。

因窗口而兴

在绥芬河新国门的连廊内，在绥芬河老火车站的展厅内，在绥芬河博物馆的展示墙上，你都会看到一张关于元宵节灯会的老照片。

1987年，当时的国务院经贸部授予绥芬河市对苏开展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权限。山城站在了新的历史起跑线上。从此，田园般的生活中注入了“国际意识”。灯会，亦是如此，那时候，每年的元宵节灯会，几乎就是一场比赛洽谈会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绥芬河还是一个“一条马路、一盏灯，一个喇叭全城听”的万人小城。随着中苏关系缓和，上世纪80年代末，绥芬河市开始与相邻的波格拉尼奇内开展贸易合作。贸易一开，绥芬河迅速成为中国东北开放的一扇窗口。

在不断探索中，边境贸易在绥芬河慢慢展开了。1987年10月26日，绥芬河与滨海边疆区易货贸易正式开通，在天长山脚下小绥芬河南中俄边境附近，双方设立一处铸铁手动挡杆，用以规范过境人流和车流，这就是绥芬河的第一代“国门”，现在，这道国门正安静地伫立在绥芬河的中俄边境线上。

已经退休的原绥芬河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恩泰，以前总愿意和老伴一起到绥芬河国门那走一走，看看已经正式投用的第三代国门，再看看已经“退役”的第一代、第二代国门。

“兴边通贸，让绥芬河有了今天。”李恩泰说。1991年10月1日，第二代国门落成使用，绥芬

河拥有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国门。

如果说第一代国门见证了绥芬河现代边境贸易的开始，那么这座集过客、过货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建筑，见证的则是绥芬河口岸的迅速成长。从上世纪80年代末汽车临时过货运输口岸到1994年成为国家客货运输一类口岸，绥芬河在贸易中迅速成长，一个边陲小镇成为远近闻名的“国境商都”。

2012年8月，绥芬河第三代国门正式开始建设，2014年底新国门建成。第三代国门高51.8米，长81.8米，跨度54.1米，双向8车道通行，国门主体结构共分九层，气势雄伟。

站在新国门上，人们可以眺望对岸的俄罗斯和往来中俄两国的车辆、人群，还可以看到手动挡杆的一代国门和已经“退役”的二代国门。

“从铸铁挡杆，到二代国门，再到今天雄伟的新国门，它们记录了绥芬河市的发展，也记录了绥芬河作为中俄经贸往来窗口的日益繁荣。”李恩泰说。

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窗口，从来都是绥芬河的使命。

因流动而靓

初到绥芬河的外地人，常会误以为自己走出了国门。

这里可以用卢布作为流通货币，满大街都是俄语招牌，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在街道上几乎随处可见，其貌不扬的老大爷，可能也会说上几句俄语。

在绥芬河，几乎人人心里都装着买卖，如果你和一位等红灯的出租车司机在不经意间提起汇率时，多半他会随口说出来，因为他很可能还经营着一家小型贸易公司。

这一切，都源于市场给绥芬河人留下的深刻烙印。

“不管在街上还是商店，大人小孩见到老外就说‘欠欠’（交换之意），随时随地就做买卖。”绥芬河商人李佰波回忆当年场景时说。上世纪90年代，俄罗斯轻工产品匮乏，成就了绥芬河的“易货贸易”。当时绥芬河几乎全民“欠欠”，当地人站在街上用旅游鞋、运动服等轻工产品交换俄罗斯人

的手表、呢子大衣、望远镜等物品。

“那时候在此地做买卖的，三分之一是本地人，三分之二是外地人。绥芬河每天有一列回俄的列车，乘客全是扛着各种大旅行包满载而归的俄罗斯人。”李佰波说。

几年前，“欠欠”重现绥芬河，不少俄罗斯人又来“摆摊”，一时间勾起了许多绥芬河人深处的记忆。起初，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，不能直接沟通怎么做买卖，有一个计算器就够了。要多少钱，直接按下数字，你来比划我来猜，其实也不是问题。

“随着‘欠欠’，语言什么的也就都会了。”李佰波说。

为解决这种散乱无序的交易状态，绥芬河市筹建起一座3000多平方米的五星楼宇，取名青云市场。正是这个拥有560个摊位的市场，让绥芬河一跃成为当时中俄沿边开放地区最活跃的商贸中心之一。

“那时生意太火了，一个月赚几十万的人有不少。”48岁的浙江商人蔡发辉是第一批入驻青云市场的客商。他回忆，那时的商场人山人海，喧嚣不绝，成为中俄商家眼中的“淘金地”。随着中俄传统贸易变化，如今青云市场商品覆盖服装、鞋帽、日用百货等上万个品种，成为中国南方轻工产品和机电产品开拓俄罗斯市场的“门面”。利用多年积累的俄罗斯客商和人脉，青云市场正向对俄电商、娱乐、餐饮、文化、旅游等多领域进军，近几年平均年交易额达10多亿元人民币。

疫情来袭前，俄罗斯女孩列娜非常喜欢来绥芬河购物。“中国商品性价比很高。”列娜告诉记者，她来自俄罗斯海滨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，距离绥芬河约200公里，她常搭乘客车往来两地。

先购物，再去马克西姆餐厅吃饭，周末的时候可以在绥芬河的电影院看看电影，在酒吧里聊聊天……

那时，宽敞、整洁的绥芬河客运站国际候车大厅里，经常可以看见数十位像列娜这样喜欢中国商品的俄罗斯女士，带着厚重的包裹排队候车，符拉迪沃斯托克、乌苏里斯克、斯拉维扬卡，在这些城市中，绥芬河是个响亮的名字。

按规定，她们每人每次最多可携带50公斤货物出入境，这里的长途客车特意加挂了货物拖车。

流动，是口岸和口岸人的天然基因。

因“大爱”而“战”

许多绥芬河人都说，这座小城现在太难了，小小的肩膀扛起了不能承受之重。疫情来袭之初，绥芬河一直保持着本土病例为零的纪录。如今，往日繁华的口岸，不得不按下客流暂停键。

绥芬河是中国仅有的两个拥有公路、铁路两个一类口岸的对俄口岸之一，也是中俄经贸大省黑龙江最大的口岸，其公路口岸扩能改造完成后，有24条出入境旅客通道、12条货检进出境通道，口岸年通关能力达到600万人次、车辆55万辆次、货物550万吨。铁路口岸经过多年扩能改造，换装能力达3300万吨。

客流虽然按下了暂停键，但口岸的窗口职能，依然在发挥着作用。绥芬河是俄罗斯远东地区许多城市的“菜篮子”，这几天，绥芬河的蔬菜大棚里，员工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，依然忙碌着，他们种植的蔬菜，将由俄罗斯运输公司协助出口至远东地区。作为中俄最大的铁路货运口岸站之一，标志着这座城市活力的火车笛声依然不断在小红山上空鸣响，一辆辆俄罗斯进境的货运列车，还在承载着两国的经贸往来。

边陲小城拉响疫情警报，国家和黑龙江省有关部门迅速行动，“外防输入、内防扩散”。国家卫健委日前已经组派工作组和专家组赶赴绥芬河；一些从湖北归来的黑龙江省医护人员，刚刚结束休整，又重新披上白色“战衣”赶赴口岸一线，为了同胞的健康，为了全球携手抗疫，保持拼劲打好新战“疫”。

黑龙江省对所有入境人员实行闭环管理、分层救治，绥芬河则全市总动员，全力战“疫”。小城大爱，春暖无声。边境线上冰凌花已经破冰盛开，战“疫”过后，百年口岸必将烟火重生，喧闹重现。

本报记者冯源

走读

“地炉文火续续添，乾釜柔风旋旋炒。”

这是清高宗弘历在登基的第十六个年头，南巡杭州，在龙井村边的天竺寺，写下的《观采茶作歌》。

虽然是中国有史以来产量最大的诗人，但是就诗品而言，除了皇帝的自我感觉，以及臣子的阿谀奉承之外，没人觉得会有多好。

不过，他巡视龙井时写的一些诗作，倒是很接地气，再现了茶农手工炒制茶叶的细节。西湖龙井茶手工炒制技艺，如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在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金家岭村，聋人茶农马勇就是小有名气的带货达人，清明前后，他不是上山采茶，就是上网卖茶。凭着家传的一亩多茶园，最近，马勇每天要做一场直播，采下的茶叶最远销到了白山黑水。

马勇跟随父母从小采茶，20岁左右开始学习炒茶，他们家世代以茶为生，但是具体有几世几代，他自己也未必说得上来。

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

杭州乃至浙江与茶叶的渊源，可以先从唐宋说起。

在这两个朝代，杭州曾先后迎来过两位最负盛名的“市长”——白居易和苏轼。在这里，他们兴利除弊，济世安民，也少不了留下颇多风雅之事，其中的“茶话”就有若干。

在杭州北高峰下的韬光寺，烹茗并古迹尚存。据说，它就是白居易与韬光禅师的烹茗之处。白居易曾作诗邀请韬光前来做客，但是被禅师回诗婉拒，于是白刺史登门拜访，随后便结下了诗茶之缘。

唐代是中国茶叶全面兴盛的重要时期，也是浙江茶叶的大发展时期。唐代全国产茶州郡达78个，其中位于今天浙江区域内的就有10个州郡。

而到了宋代，浙江名茶进入了重要繁荣时期，产茶州县比唐代又有所扩大，名茶已经达40多品。宋哲宗元祐五年（1090年），西湖西山中的龙

井迎来了上任已有一年的杭州太守苏轼。和他的前辈白居易一样，他也去访问了一位高僧——被认为是龙井开山祖的辨才和尚。宾主之间相得甚欢，自然又是诗茶之交。

在杭州，苏轼不但留下了“欲把西湖比西子”的“西湖第一名诗”，也写下了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的“中国最美茶诗”，在诗文中以博喻称雄的东坡，在喻物喻茶之时，居然不惜重复喻体，以美人比湖山，以佳茗比佳人。这也就难怪有后人将其集句成联，悬挂于茶室之内，令茶客们拍案叫绝了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“最美茶诗”的诗兴源于闽中茶叶，苏轼还为茶叶写过一篇拟人化的《叶嘉传》。但是在苏轼的80首茶诗中，两浙一路的名茶可谓贡献卓著。在第一次任职杭州结束、调任密州后，东坡登临超然台，就曾填下一阕《望江南》：“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。”

茶、诗、酒，在文豪的心中须臾不可或缺，而茶居首位。谁又能说，不是一缕飘自江南的茶香，让文豪选用了这一词牌呢。

“茶，南方之嘉木也”

在白居易守杭之前，“茶圣”陆羽已经在相邻杭州的湖州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

许多人提到陆羽，都会想到《茶经》中的开篇语：“茶，南方之嘉木也。”

他在湖州两部盛桓了近40年，写就了三卷十节七千字之《茶经》。它是全世界现存最早、最完备的一部茶叶专著，系统总结阐述了唐代及唐以前的茶叶发展历史。

也正是陆羽在当地生活期间，湖州治下的长兴县在顾渚山下兴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贡茶作坊。《茶经》云：茶叶的色泽，“紫者上”，外观则是“笋者上”。而顾渚紫笋茶的进贡正始于中唐，直至

且将新火试新茶

清初，在浙江地至今还保留了大量与贡茶有关的摩崖石刻。

如果继续上溯浙江茶叶的历史，我们可以回到新石器时期。目前从考古资料看，在距今7000—8000年前的萧山跨湖桥遗址，人们就发现了茶籽化石。

而根据可考的文字资料，浙江名茶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西晋神话志怪小说集《神异集》中。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茶，遇到了道家人物丹丘子，丹丘子带他到了瀑布山，让他采到了“大茗”。至今，人们在余姚的瀑布山，还能品尝到“瀑布仙茗”，它可能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浙江名茶。

在浙江各地茶叶的起源传说中，儒、释、道就是这样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，这也是茶文化能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源头活水。在浙江，无论是“洞天福地”，还是佛教名山，当地都少不了名茶出产。

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的专家告诉记者，浙江北接长江中下游平原，大部分属于东南丘陵地带，河流纵横，山岭连绵，季风显著，四季分明，光照较多，雨量丰沛，年气温适中。县与县之间往往方言不同，小气候也不同，而各县间的名茶也有所不同。

“君不可一日无茶”

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，闻于鲁周公。”炎帝神农氏是中国上古的三皇之一，相传他尝百草时，发现了茶叶的神奇功效。

到了明代，浙江乃至中国的茶叶又遇到了其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帝王。明太祖朱元璋体恤民力，认为制作团饼茶劳民伤财，下诏改贡散茶。从此，中国人开始撮泡茶叶，而不再像之前那样将茶叶制成团饼，再碾茶末，点茶饮用。而在宋元时期，

西湖南北两山诸茶就已经加工成散茶供人饮用，“走在前列”，自然也就脱颖而出。

到了清朝，乾隆是龙井茶最大的拥趸，他六下江南，四到龙井，历次都为“龙井八景”题咏，使龙井茶声名大噪。如前文所述，他对茶艺相当精通。著名茶学专家程启坤就曾特别指出，《观采茶作歌》开头那几句“火前嫩，火后老，惟有骑火品最好”，其中的“火前”“火后”，就是指寒食节禁火的前后。

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享高寿、实际执政最久的皇帝。相传，他在禅位第十五子嘉庆帝时，有大臣为表忠心，曾以“国不可一日无君”相劝，对儿子心中有数的老皇帝哈哈大笑：“君不可一日无茶。”

从晚清开始，浙江绿茶大量外销，宁波成为当时国内主要的茶叶出口口岸，这一势头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。但随后，无论是内销还是外贸，浙江茶业的发展之势都被日本的侵略打断，历史上留传的绝大部分名茶逐渐停产失传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浙江茶叶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，特别是龙井茶，得到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。

“肇锡余以嘉名”

改革开放后，通过挖掘、恢复历史名茶和积极创新名茶并举的方针，发挥浙江丘陵地区的小气候优势，名茶犹如雨后春笋般重生。仅收录在相关地方志中的就有41款，创新名茶70款。

细品茶名，便觉余香满口，能感受到茶人们的斟酌推敲，不曾父母为子女取名的期许。“皇览揆余之初度兮，肇锡余以嘉名。”

——以山为名。浙江境内的名山，往往也是茶山。莫干山有“莫干黄芽”，天目山有“天目青

顶”，雁荡山有“雁荡毛峰”，天台山有“天台山云雾”，而在茶道东传日本的余杭径山，依托“径山茶”的“径山茶宴”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——得水而兴。“天下第一秀水”千岛湖生发出“千岛银珍”“千岛玉叶”两个茶叶品牌。在钱塘江发源地开化县，大龙山顶顶潭蒸养出“开化龙顶”，而在余姚，仙人指路而得的“瀑布仙茗”恢复生产也已经有40余年。

——云雾缭绕。从春至秋，东南季风带来海上的水汽，水汽在丘陵沟壑间抬升，腾云致雨。“云雾不绝，土人多种茶于其上”，便有了“安顶云雾茶”“桂岩雾尖”“磐安云峰”“雪水云绿”“望海云雾”……

——玉碧银白。“松阳玉峰”“衢州玉露”“仙居碧青”“松阳银猴”“常山银毫”“兰溪银露”“新安白茶”“安吉白茶”……这些根据外形色泽创制的茶名，令人大有秀色可餐之感。在“两山”理论起源地浙江安吉，安吉白茶不但是扎根当地的富民茶，更是远赴西部的“扶贫茶”。

“从山阴道上行，山川自相映发，使人应接不暇。”这是冬尽春来，浙江山野之间的宜人景色。而绵延起伏的山岗之上，茶农精心培植的茶树成片成行，犹如碧波翻滚，绿锦铺展，更是以人工之功，增添造化之美。

目前，浙江11市90县(市、区)中，有10市74县(市、区)产茶，到2019年，全省茶园总面积306万亩，总产量19万吨、总产值225.5亿元，三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。

从春分到谷雨，太阳直射点越过赤道，向北回归，也正是浙江各地采茶制茶的农忙季节。在60多年前，著名音乐家周大风多次来到茶区采茶炒茶，体验生活。五访梅家坞的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帮他修改了歌词。

“溪水清清溪水长，溪水两岸好风光。哥哥呀上顶下吸插秧秧，妹妹啊东山西山采茶忙……”嘉名有好音，大风谱国风。一曲《采茶舞曲》传唱至今，更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，伴奏中国，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。